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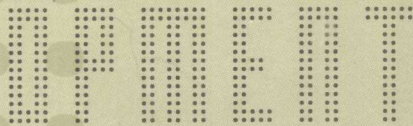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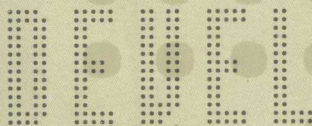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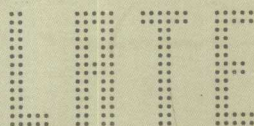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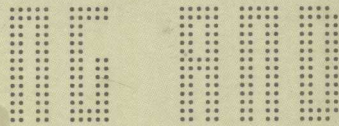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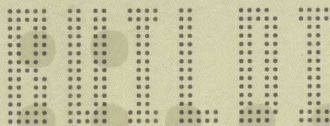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主编 朱天飏 | 执行主编 曹海军 刘骥

DAVID WALDNER

[美] 戴维·瓦尔德纳 著



国家构建与后发展

刘娟凤 包刚升 译



NLIC 2970701260

DAVID WALDNER

[美] 戴维·瓦尔德纳 著

国家建构与后发展

刘娟凤 包刚升 译



NLIC 297070126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State Building and Late Development by David Waldn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9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Beijing
Sourcebook Agency.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92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构建与后发展 / (美) 瓦尔德纳著; 刘娟凤,
包刚升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2

(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书名原文: *State Building and Late Development*

ISBN 978-7-5463-4655-7

I. ①国… II. ①瓦… ②刘… ③包… III. ①政治经
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2627号

国家构建与后发展

著 者	[美]戴维·瓦尔德纳
译 者	刘娟凤 包刚升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曹海军
责任编辑	周海莉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9.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4655-7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

朱天飏

2001 年末我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试讲时，题目就是“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看到听讲教师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是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一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时，都用“政府与市场”作为课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课时也是要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里讲。但几年过去，形势已有所不同，我于 2006 年初出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课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清华大学的曹海军老师建议和推动，吉林出版集团决定出版这套经典译丛。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nfield)于 1965 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将发达国家不同

的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后来学者们对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的研究更系统地比较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更深入地分析了经济调整背后的政经互动及其模式,于是开创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多方法(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跨地区(不仅是发达地区还有后开发地区和转型地区)和跨时间(如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当代全球化的政经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领域。

当然,正是因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铺开面很广,反而难以成形。这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领域都开创于 20 世纪 70 年代对石油危机之影响的研究。前者思考石油危机与美国的衰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后者分析不同国家对石油危机的应对之策及其背后的政经互动。概括地说,前者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后者则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研究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间的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部分,理论层次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被整个领域所接受;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一个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很少与研究其他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对话,因此缺少几个能够为整个领域所接受的理论范式。我想我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编写教材和主编经典译丛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领域整个展示给大家。

如上所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对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的跨时空比较。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也可以放大成为宏观的国家、社会与经济,而国家既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又是一个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国家至少有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国际层次,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与其相对的是其他国家;在国内层次,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

力工具,与其相对的是其统治的民众所在的社会;在个人层次,国家是政治家和官僚等个体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与其相对的是其他个体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际层次的国家,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则主要在国内和个人层次上,特别是国内层次。

对国家概念清楚的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读好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不同层次上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希望这套经典译丛的出版不仅能够促进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中国的成形和发展,同时也能够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这套丛书开始的选题计划和最后的审校都由我承担(个别非我审校的译著会明确标出审校者姓名)。我希望在此感谢曹海军老师。没有他的倡议和推动,这套丛书是不可能有的。曹老师作为执行主编还承担着很多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他耐心细致、温文尔雅,从容解决了各种问题,使我能够专注于丛书的审校。也要感谢吉林出版集团积极推动和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崔文辉先生的大力支持。最后,我要感谢在我比较政治经济学课上学习的所有“孩子”,他们是我在中国推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永久动力。

2007 年末

于北京大学廖凯原楼

前 言

——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彼得·J. 卡岑斯坦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这两种视角可以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说明。基于国家固定的资源禀赋的假设,比较优势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的基石。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观点,如果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而不只是绝对优势,国际劳动分工就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收益。但是,就像弗雷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其他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比较优势概念存在着重要缺陷。这个理论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静态分析。按照它的逻辑,葡萄牙无论在1780年、1880年,还是在1980年就只能生产酒,而英格兰则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从1780年生产服装提升到1880年生产重型机械,并再提升到1980年生产计算机芯片,从而因生产类型的提高在生产效率和经济福利上收获巨大。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固化了一系列用市场语言来表达的政治关系,

并且支持了那些导致各国经济不断趋异的政策。

对这个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挑战来源于对竞争优势的一种明确的政治解释。根据这个观点,无论是葡萄牙的太阳还是英国的资本,每个国家并不持有固定的资源禀赋。相反,竞争优势学说假设,每个国家经济都在努力增加它们的资本存量、加强它们劳工的技术基础以及促进科技知识在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程序过程中的应用。在过去两代人的努力下,亚洲的发展型资本主义成为竞争优势的大展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探讨国家兴衰、寻求解读动荡变迁的领域。

上述两种视点面临着同一个学术挑战:如何将观察到的政治或经济结果和政治或经济解释因素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两者相距甚远的时候。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曾发掘出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令人注目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的认知如何进步呢?因此,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紧随上述学科的融合是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学科的内涵问题相比,方法问题是次一级的问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统计学与案例叙述并不是天生的优劣易辨。现实通过解释被分类并数字化,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足够先进,能够将定类数据或定序数据转化成定距数据,并运用高级统计技术进行处理。哪一种方法论策略更合适,应该根据面对的问题而定,而不取决于不变的方法论偏好。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的科学性只能来源于对国家和大型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解释多种现象的规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需要获得原始数据以及对当事人生活经历的细微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局限与限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在现实的时间——不可逆转性、推测性、非线性和非平衡性等特点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大部分定量分析都普遍依赖一般线性模型,其

实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现实的许多重要部分。而另一方面,以案例为中心的定性分析往往忽视对非现实世界的系统质询,无论是通过反事实推理还是通过复杂性理论所提供的模拟方法。因为当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比用于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多得多的分析方法,那些存在于定量与定性分析支持者之间的方法论争论,特别是孰优孰劣的争论,好像变得无地自容了。

现代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崛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适应混合经济与社会福利国家所达成的政治妥协,而这种政治妥协则将西方左、右两派的政治极端势力推向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带。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国家化政治、60 和 70 年代的统合主义政治、80 和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都游弋于这个中心的左右。上述每个时期都是重大变迁,每个时期都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线索。

同样重要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趋势增加了横跨国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密度。其实,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部分,国际世界已变成了全球的概念,对各种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都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新的国际和全球背景里,崭新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模式开始演化,特别在拉丁美洲、东亚、东南亚以及东欧地区,就连中东和非洲也出现了新模式的萌芽。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现实中的增加,其分析类型反而变少了。对于研究中国高速发展和新型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讲,为什么当代学术定式很难在新世纪成功解读中国市场经济的崭新特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将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挑战,努力解释这个市场经济史上的伟大试验。

2007 年末

于康乃尔大学

缩 写

ANAP=祖国党(土耳其)(Motherland Party(Turkey))

DNP=民主国家党(韩国)(Democratic Nationalist Party (Korea))

DP=民主党(土耳其)(Democratic Party (Turkey))

ELG=出口导向型增长(export-led growth)

FDI=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DP=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NP=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ISI=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JP=正义党(土耳其)(Justice Party(Turkey))

LS=叙利亚里拉或镑(Syrian lira or pound)

NSP=民族救国党(土耳其)(National Salvation Party (Turkey))

RPP=共和人民党(土耳其)(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Turkey))

SEE=国有企业(土耳其)(State Economic Enterprise (Turkey))

SPO=国家计划办公室(土耳其)(State Planning Office (Turkey))

TFF=土耳其农民联合会(Turkish Federation of Farmers)

TL=土耳其里拉(Turkish lira)

TOB=土耳其商会(Turkish Chambers of Commerce (Turkiye Odalar Birligi))

TUCA=土耳其农会联合会(Turkish Union of Chambers of Agriculture)

UAR=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

致 谢

当我 1984 年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参加雅亚·萨多夫斯基(Yahya Sadowski)的比较政治学导论课程时,我就开始思考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这一问题。我非常感谢他把我带入了这一让我长期着迷的课题。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能够跟一群很友好的学者和很学术的朋友在一起。在伯克利,肯·乔伊特(Ken Jowitt)、罗伯特·普赖斯(Robert Price)、克雷恩·乔杜里(Kiren Chaudhry)和艾拉·拉皮德斯(Ira Lapidus)给了我知识上的极大鼓励和支持。我感谢伊尔卡伊·苏纳尔(Ilkay Sunar)把我引入了对土耳其政治的研究——在这项研究的形成阶段,伊尔卡伊·苏纳尔还与我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并在土耳其对我的研究进行了评估。我本书中呈现的大量思想,极大地受益于在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国家形成研讨班中与其他成员的讨论,特别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卡门扎·加洛(Carmenza Gallo)和阿里尔·萨尔兹曼(Ariel Salzman)。我也得益于与哥伦比亚大学中东研究所同事们富有启发性的很多谈话,尤其是莉萨·安德森(Lisa Anderson)、格雷格·高斯(Greg Gause)、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亨利·巴齐(Henri Barkey)和马蒂·马林(Marty Malin)。

我对社会科学的思考,以及我在本书中呈现的观念,都受到很多年来我在伯克利的朋友和伙伴们经年累月知识交流的深刻影响,他们是:鲍勃·布洛克(Bob Bullock)、鲁斯·菲格斯(Russ Faeges)、约翰·

耶林(John Gerring)、史蒂夫·汉森(Steve Hanson)、彼得·金斯敦(Peter Kingstone)、格伦·鲁滨孙(Glenn Robinson)和阿伦·斯瓦米(Arun Swamy)。更直接地说,我得益于杰勒德·亚历山大(Gerard Alexander)、鲍勃·布洛克(Bob Bullock)和赫尔曼·施瓦茨(Herman Schwartz)的建议,他们慷慨地阅读和评论了本书几个版本的草稿。我尤其感觉对塞尔斯·鲁迪(Sayres Rudy)亏欠很多,他具有令人惊叹的分析和编辑能力,这方面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我还要感谢亨利·巴齐(Henri Barkey)、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乔舒亚·丁斯塔格(Joshua Dienstag)、约翰·艾维切里—亨特(John Echeverri-Gent)、罗伯特·法托恩(Robert Fatton)、史蒂夫·海德曼(Steve Heydemann)、约翰·麦克拉伦(John McLaren)、卡罗尔·梅尔尚(Carol Mershon)、黛布拉·莫里斯(Debra Morris)、索利·厄泽尔(Soli Ozel)、威廉姆·匡特(William Quandt)、莱恩·朔帕(Len Schoppa)和布莱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等人,他们阅读了我部分章节的草稿,并对我的问题作了回应。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罗杰·海登(Roger Haydon)为我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支持和编辑方面的帮助。最后,我非常感谢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学者与公务员,是他们帮助了我的实地调查;还要感谢我在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所有朋友,是他们让我的研究工作充满了乐趣。

著作并不完全是以学院式的方式写成的。叙利亚的研究获得了福布莱特(Fulbright)国际教育研究所的资助,而土耳其的研究获得了福布莱特—海斯(Fulbright-Hays)博士论文海外研究基金的资助。伯克利的国际研究所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资助。外语学习获得了外国语研究领域基金的资助,同时还获得了伯克利中东研究中心安排的卡内基(Carnegie)基金的资助。而弗吉尼亚大学的香农(Shannon)高级研究中心慷慨地给我以学术假期,让我能够专心完成本书最后一稿的写作。

我妻子伊丽沙白·汤普森(Elizabeth Thompson)写作黎巴嫩和叙利亚现代史的时间,同我研究叙利亚和土耳其政治经济的时间一样

长。我们共同分享的不仅有学习新语言、研究外国文化,以及把研究成果与经验发展成专著的困难和痛苦经历,而且还有共同结交新朋友、探索新地方,以及享受生活的快乐。怀着深爱 and 感激,我把这本书献给她。

关于音译的说明

在这项研究中,音译的惯常做法对专家来说是不必要的,而对非专家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因此,除了中间和最后的阿拉伯语中的“*äyn*”以外,我忽略了所有的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发音字母。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这一简单表述能够帮助读者去收集相应的传记资料。

戴维·瓦尔德纳

于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

目 录

缩 写	1
致 谢	1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1
第二章 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22
第三章 建立联盟与构建国家:土耳其	61
第四章 建立联盟与构建国家:叙利亚	87
第五章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的实践	111
第六章 东亚精英的凝聚力与国家建设	148
第七章 后发展的集体困境	174
第八章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发展结果	204
第九章 源自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234
第十章 理论与方法的再思考	259
索 引	272
出版说明	1

第一章 制度起源与经济后果

“狮子造了笼子却把自己困在了笼子里。”这句古老的阿拉伯谚语在如今的叙利亚产生了回响。狮子的阿拉伯语是阿勒阿萨德(*al-as-ad*),这也是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勒阿萨德(Hafiz al-Asad)的名字。作为对权力必然会受到限制的一种评论,这条谚语暗示着为了某种特定功能而建立的制度,经常会带来约束制度创建者本身的意外结果。本书中的观点是,叙利亚和土耳其的精英们设计了承诺保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新的国家制度与机构(*state institutions*)。然而,由于这些制度很好地履行了它们的政治功能,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即使在承认他们的经济业绩很糟糕之后,仍然能够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看似强有力的领导人被他们自己缔造的制度之笼束缚住了手脚。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没有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并非所有的笼子都具有类似的限制作用。韩国的精英们也建立了保证体制内当政者权力的新制度,同时却促发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和工业转型。大量的研究认为,韩国的独特性能使官员们制定和执行发展型政策。这种政策把经济活动导向具有更高增加值的产品上,同时使经济获得并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于是,不同的国家构建路径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

为什么国家构建有时候促进经济发展,而有时候却阻碍甚至是破坏经济发展呢?本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两个一般性的主题。第

- 一,本书提供一个框架来解释特定的国家制度的起源。国家制度是本书的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第二,本书提供一个框架来系统地分析国家制度与造成经济后果的政策之间的关系。根据下文的定义,经济后果是本书的因变量。本书随后的论点要解释叙利亚 1963—1980 年和土耳其 1950—1980 年相对糟糕的经济绩效,同时还要解释韩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间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一时期是重要的十字路口,其后续影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通过分析从非直接统治型国家(mediated states)向直接统治型国家(unmediated states)*的转型,解释了不同的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profiles)。在非直接统治型国家,国家精英通过与地方权贵的联盟进行统治;而在直接统治型国家,制度和机构取代了权贵并把国家、经济和社会联系在一起。随着从借助地方协调者的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旧制度被重新定义,新制度建立了起来,而国家则扩大了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换句话说,直接统治型国家的创建,使新制度框架的充分发展成为必需。四种制度化的安排界定了国家的发展型能力(developmental capacity):国家社会关系、官僚制的性质、国家财政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模式。通过分析政治上宏观结构变迁的路径,我要找到这些具体制度的起源,以及它们与不同制度框架的组合。

具体来说,我分析了国家转型的两种路径。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国家转型与下层阶级被吸纳进跨阶级联盟同时发生。在第二章,我会证明国家转型与建立阶级联盟的结合决定了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与之不同,在韩国,国家构建先于吸纳平民(popular incorporation)。因为韩国的精英在制度转型时期并不依靠平民的支持,他们能够塑造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新制度。作为结果,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构建产生了我所说的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precocious Keynesian

* Mediated states 和 Unmediated states 在中文语境中如果采用直译,难以找到准确的词汇,故此处采用意译,翻译成“非直接统治型国家”和“直接统治型国家”。两种国家形态的区别,请继续阅读下文,而且下文还专门提到从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译者注

states),而韩国的国家构建则产生了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可以肯定的是,韩国的精英最后也吸纳平民的支持,但这是在10年的快速增长和工业转型之后。简而言之,吸纳平民相对于国家转型和大规模工业发展的时机,最好地解释了追求经济发展的持续努力所产生的结果。

但是,如何解释国家构建的不同模式呢?我通过研究政治精英微观层次的选择,来解释宏观结构变迁怎样塑造了制度结果。这里的政治精英需要游走在当政者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之间。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案例证明这样一种观点:制度暗含了国内行为者在日常政治实践中不断表达其偏好的努力。莱克(Riker)也曾经恰到好处地把制度描述为“凝固的偏好”(congealed tastes)。^①但是,也必须分析政治行为者提出或支持其偏好的环境,因为即使是一个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也经常要受到制度形成过程的制约,正如本书的比较研究证明的那样。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政治精英对政治稳定、牢固地控制权力和快速经济发展的偏好,与韩国的政治精英基本上没有区别。造成两者差异的是环境的不同——正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政治精英追求其偏好,并为了实现其目标而创建制度。不同的环境,导致具有相同基本偏好的行为者塑造了不同的制度结果。

更具体地说,我关注结构性环境(structural context)的约束与机会,而正是结构性环境决定了选择的可能性。但是,结构(structure)和行为(agency)在不同的案例中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叙利亚和土耳其的精英面对的结构条件,使其受到高度的约束,以至于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与之相比,韩国的精英在面对制度选项进行选择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这种差异产生了一个因果条件上的不对称性:虽然我认为在中东的案例中,具有的是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这些条件导

^① William Riker, "Implications from the Disequilibrium of Majority Rule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 (June 1980): 432—446.